

学兼南北的刘孝标

吴有祥

(潍坊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)

摘 要 刘孝标的身世遭际与其学术风格间有密切的关系。他早年流落塞北,将青、齐一带探寻义理、玄释兼习的学风带入北方,后由北返南,将拘守章句训诂的北朝学风带入南方。他的一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学风融合的学术趋势,开启了隋唐学术统一的先河。

关键词 刘孝标 苦难 身世 南北学风

中图分类号 I06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1-4288(2009)03-0001-04

南朝齐梁年间的学者刘孝标,以博洽多识和著述宏富而名垂史册,尤其是他注释的《世说新语》一书,征引繁富而裁剪得当,对刘义庆原书颇多纠谬补阙之功,实际等于另一部《世说新语》,久为士林所称道。与同时代沈约、任昉等出身高门的学者不同,刘孝标家世寒微,幼年流落塞北,备尝了人世的苦难艰辛,还曾一度出家为僧,在极艰苦的困境中发奋苦学,其渊博的学识植根于他坎坷多难的人生遭际,可称为“困而学之”的典型。且刘孝标与北海曾有一段因缘,今一并述之。

刘峻,字孝标,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(462),卒于梁普通二年(521)。《南史》作“普通三年”,误。《梁书》卷五十、《南史》卷四十九有传。两书均称其为平原(今山东平原县)人,只是举其族望而言。他本是东汉皇室胶东康王刘寄之后。其先祖刘植汉末时任平原太守,遂定居平原,成为当地的大族。十六国后期,鲜卑慕容氏因为受到日益强大的拓跋氏的不断进攻,而被迫渡河南下,向河南及山东青、齐一带迁移,刘峻的祖父刘昶跟随南燕主慕容德东进青州,定都广固(遗址在青州西北尧王山下),而刘氏一族则定居在北海都昌(今昌邑),遂为北海人氏。义熙六年(410),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南燕,攻克广固城,刘昶降晋,刘裕命他为青州中从事,刘峻的父亲刘琨(《南史》作“刘琨之”)仕宋至始兴内史,于是全家迁往江南。刘峻于大明六年出生在首都建康。

《南史》本传又载刘峻原名法武。陈垣先生根据其兄名法凤,而考证出他原名应为法虎,《南史》避唐讳,改虎为武。^[1]刘峻的童年非常不幸。他出生刚满期月,父亲刘琨就去世了,他们母子三人作

为后迁的北来侨民,在江南无依无靠(其堂兄刘怀珍虽然在宋仕宦显达,但似乎并未接济他们),生活顿时陷入绝境,于是他的母亲许氏便携刘峻及其长兄法凤回到北海故里,栖居在东阳城(今青州)。此时北魏已统一黄河流域,而刘宋的国力则日趋衰弱,冀、青、兖数州之地在北魏军队的进逼下日渐沦丧,青州尤其是宋魏双方争夺的重点。宋孝武帝泰始五年(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,469),魏将慕容白曜攻陷被围困了三年的东阳城,俘虏了宋青州刺史沈文秀,青、冀之地尽入北魏版图。这时刘峻刚满八岁,就与他的母亲一道被作为奴婢掠往中山(今河北定县)。中山富人刘实(《南史》作刘宝)见他们母子可怜,以束帛将他母子买下,并教刘峻书学,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但好景不长,魏人得知他们有亲戚在江南,为防止他们逃亡,于是将母子三人迁往更远的魏都平城。《通鉴·宋纪一四》“明帝泰始五年”载此事如下:

(皇兴三年)五月,魏徙青、齐民于平城。置升城、历城、民望于桑乾,立平齐郡以居之。自馀悉为奴婢,分赐百官。魏沙门统(掌管佛教的僧官)昙曜奏: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,即为僧祇户。粟为僧祇粟,遇凶岁赈给饥民。又请:民犯重罪、及官奴,以为佛图户,以供诸寺洒扫。魏主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,遍于州镇矣。

北魏军队每次出征作战,总要掳掠大量的平民为奴婢,班赐给出征的将士及在朝的文武百官,被俘的平民被称为“生口”。他们不仅要从事家内执役,而且还要替主人耕种田地,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北魏平齐后,迁移了一部分富户于平城附近,置平齐郡以居之;其馀青齐人民,悉没为生口,分赐百官,称为“平齐户”。不久献文帝又应沙

门鬲曜之请,创立了僧祇户与佛图户两种名目。允许被俘北迁的齐民每年送给僧官六十石谷(僧祇粟),即可取得僧祇户这个名义,僧祇户可以获得僧官的一些庇护,避免官府和宗主的双重压迫。而那些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则沦为佛图户,被发配给寺院,称寺户,实即寺院的奴隶。刘峻一家孤儿寡母,显然拿不出六十石谷交给寺院,因此只能沦为佛图户。《南史》本传称:“居贫不自立,与母并出家为尼僧,既而还俗。”

刘峻少年出家,自然是无奈之举,但却因此使他走上读书治学的道路。据陈垣先生考证,刘峻出家的寺院即平城西郊武州山北崖的云冈石窟寺,而云冈石窟的开山始祖即是北魏高僧昙曜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及《续高僧传》记载,昙曜不仅主持开凿了云冈最初的五个石窟,“镌建佛像各一”,并且还在石窟寺中翻译佛经十四部。由于刘峻天性好学,加上此时孝文帝正在北魏境内大力推行改制,敦崇儒学,振兴文教,“中原图籍,必渐搜集,云冈石窟寺新建,梵汉经典,正好贮藏。”这使刘峻有机会博览寺内典籍。《梁书》本传称,“家贫,寄人庑下,自课读书,常燎麻炬,从夕达旦,时或昏睡,藉其发,既觉复读,终夜不寐。”说得就是他出家为僧期间的读书生活。经过十几年的发奋苦读,刘峻成为一名勤奋渊博的青年,因此当昙曜、吉迦夜等高僧在寺内译经时,自然就挑选刘峻为助手,今《开元释教录》所载《大方广》、《十地》、《付法藏因缘传》等佛经,即题“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,刘孝标笔受”。所以陈垣先生认为,刘峻才学博洽,“其根底全植于云冈石窟寺为沙门时也。”(同上)。

二

刘峻出家为僧几年,史无明文,但他逃回南朝的时间却有明确的文献记载。《文选》卷四十三载刘峻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,李善注引峻《自序》曰:“齐永明四年(486)二月,逃还江南。”从泰始五年被掳,至永明四年南还,他在北魏前后共生活了十八年,此时他已长成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了。《南史》称他回到江南后,“改名峻字孝标”,大约含有告别过去庆贺新生之意。但“人生失意无南北”,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都盛行门阀制度,高门士族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;而刘孝标这样的孤寒之士不论才学多么出众,也只能沉沦下僚。尽管如此,刘孝标回到南朝,至少在学业上步入了成熟期。虽然此前他在代北寺院中苦读了十几年,但北朝的学术文化总体上不如南朝,寺院藏书毕竟有限;回到南朝后,他的处境改善了,而且永明年间是南朝在经济及文化上都比较繁荣的时期,国内政局稳定,这些都促使其学问大进。《梁书》本传载:“自谓所见不博,更求异书,闻京师有者,必往祈借。”当时清河崔慰祖亦以好学著称,并且家中聚书至数万卷,“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,日数

十秩,慰祖亲自取与,未常为辞。”(《梁书·崔慰祖传》)西晋皇甫谧以好学耽溺典籍而被人称为“书淫”,崔慰祖也戏称刘孝标为“书淫”,可见他对刘推许之深。

这样又经过几年的苦读,刘孝标终于成为一个博极群书、文藻秀出的饱学之士。这时,竟陵王萧子良正广招才学之士,大畅文风,一时的俊才名士如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范云、任昉、萧衍等人纷纷聚集在竟陵王的西邸,形成了以“竟陵八友”为主体的文人集团。他们互相切磋学问,研讨三教,吟诗作赋,成为南齐的学术中心。刘孝标也非常想进入这个皇家学术沙龙,就设法在萧子良幕下谋一职位,但为吏部尚书徐孝嗣所抑,事不果。徐孝嗣排抑刘孝标的原因,可能是嫌他出身寒微,又是从北魏逃奔南朝的流亡人士,不能与王、谢衣冠贵胄同朝共事。

齐明帝建武年间(494—498),萧遥欣出任豫州刺史,命刘孝标为刑狱参军,甚见礼遇。但不久萧遥欣病卒,刘孝标久不得升迁。直到梁武帝天监(502—520)初年,他才被召入西省,与学士贺踪一同典校秘书。梁朝初建,梁武帝兴复儒学,广招文学博雅之士,稍有才学的士子都被授予官位,且不次升迁。刘孝标才高学富,自然也被网罗。但梁武帝本人博通坟籍,尤善文学,自以为于学无所不通,不免心高气傲,欲在学问上也凌驾群臣。他在听政之余,喜召集文士策问经史事,甚至亲自讲论三教经义。当时文人撰述,崇尚骈俪排偶,矜言隶事用典,平常聚会时也互相隶事,以此定学问之高下。沈约、王融、范云这些文学侍从之臣均以博物洽闻、熟谙典故著称,不过他们洞明世故,深知梁武帝好胜的性格,“皆引短推长”,故意装拙,以满足皇帝的虚荣心。而刘孝标为人狷介耿直,不会阿谀奉承,往往率性直言。有一次君臣在朝中策问有关锦被的典故,梁武帝与大臣各说出了若干条,诸臣皆言已尽,这时武帝试问刘孝标是否还有,刘孝标也不推辞,就请纸笔一口气写了十几条,都是他人所未道的,“坐客皆惊,帝不觉失色。自是恶之,不复引见。”(《南史》本传)从此他就仕途乖蹇,坎坷终身。

刘孝标兄弟两人。其兄法凤回南朝后改名孝庆,字仲昌。他富有文武干略,南齐末任兖州刺史,齐末内乱时举兵响应萧衍,成为梁武帝的心腹干将,后被任命为青州刺史,封馀干县男。有一次刘孝标请假去探望哥哥,“坐私载禁物,为有司所奏,免官。”(《梁书》本传)这显然是梁武帝伺机报复他的借口。梁武帝的弟弟安成王萧秀留心学术,喜交文士,他出任荆州刺史时(约在天监七年,508),招刘孝标为户曹参军,“给其书籍,使抄录事类,名曰《类苑》,未及成,复以疾去。”编纂类书是当时的学术风气,主其事者大多是博闻强记之士,刘孝标的

《类苑》没有全部编完,只编了一百二十卷,流播士林后却赢得了众口称赞。但这却招致了梁武帝的妒嫉,他为了压制刘孝标的声名,于是命徐勉、何思澄等人编纂了七百卷的《华林遍略》以压倒《类苑》。由于《华林遍略》卷帙更大,且倚仗皇权的声势,终于掩盖了《类苑》的光芒,使这部类书逐渐湮没无闻,终至亡佚。这是一起典型的权力摧抑学术的悲剧。

但真正的学术是任何外力难以摧抑的。刘孝标离开萧秀之后,他的仕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,却迎来了他学术及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。他游览了东阳(今金华)的紫岩山,喜爱那里的山水清幽,于是筑室定居下来,并写了《山栖志》一文,抒发其遁世幽隐之志,文章甚美。今存刘孝标的文章以《辩命论》和《广绝交论》最为著名(见《文选》卷五十四、五十五)。《辩命论》的主旨在于论述“性命之道、穷通之术”。他列举了古今高才至德之士命途多舛的史实,抨击了“高才而无贵仕,鸷鹗而居大位”、“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,闇主众而明君寡”的黑暗现实,抒发了自己的抑郁愤懑,最后只能将这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归结为“士之穷通,无非命也”。文章辨理入微、辞藻流丽,音节清壮,气势充沛,实际上是作者自悼身世之作。钱钟书先生认为:“刘氏声尘寂寞,宦拙遇屯,自以为身不当穷,穷盖由于报应无准,天道难凭,故一之于命。”(《管锥编》第1454页)乃自悲身世、寄寓感慨之作。

《广绝交论》的写作背景,据李善注引《梁典》曰:“刘峻见任昉诸子西华兄弟等,流离不能自振,生平旧交,莫有收恤。西华冬月著葛布帔、练裙,路逢峻,峻泫然矜之。乃广朱公叔《绝交论》。到溉见其论,抵几于地,终身恨之。”任昉是齐梁之际的文坛泰斗,与沈约齐名,当时有“沈诗任笔”之说。他为官清廉,乐善好施,性情通脱,尤其奖掖后进,“见一善则盱衡扼腕,遇一才则扬眉抵掌。雌黄出其唇吻,朱紫由其月旦。”他在世时家中常常宾客盈门,高朋满座,时人称为“龙门之游”,又号“兰台聚”,死后坟土未干,已是“门罕渍酒之彦”、“野绝动轮之宾”,人情冷暖,有如冰炭。曾受任昉扶持提携的到溉、到溉兄弟,此时见任昉的几个遗孤贫不自振,潦倒流离,竟视同路人,“悠然不相存瞻”,尤令人心寒齿冷。针对这种“驰骛之俗,浇薄之风”,刘孝标感慨万端,于是模仿东汉朱穆的《绝交论》,写下了这篇著名的《广绝交论》。文中刻划了势利之交的五种丑态,谴责了趋炎附势之徒的卑劣行径,并意味深长地指出势交小人终将导致“败德殄义,禽兽相若”、“难固易携,讎讼所聚”、“名陷饕餮,贞介所羞”的恶果。

文中几乎每句用典,虽有逞奇炫博之嫌,但铺陈排比,则又杂糅了辞赋的手法,情感真挚,辞采富艳而气骨凛然,极富感染力。字里行间充满了

郁勃愤激之气,而语有所指,因此更具批判意义。正如李善注云:“有梁之初,淳风已丧,俗多驰竞,人尚浮华。故叙叔世之交情,刺当时之轻薄。”难怪到溉兄弟见到此文要恨之入骨了。钱钟书先生认为:“梁文之有江淹、刘峻,犹宋文之有鲍照,皆俯视一代。”(《管锥编》第1406页)诚可谓至论。

三

当然,最能代表刘孝标学术成就的还是《世说新语注》。《世说新语》是记载魏晋清谈名士琐闻轶事的笔记小说,为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士纂辑而成。刘孝标替此书作注约在天监六、七(即507—508)年间,即他被召入西省典校秘书时奉梁武帝敕旨所撰。^[2]齐梁时代上距魏晋不远,玄学清谈之流风遗韵犹存,且刘孝标又博综载籍,文笔隽永,所以他的注文引据该洽,剪裁得当。注文对原文或驳或申,补充资料与纠谬考证相结合,与《世说》原书相得益彰,其中所存汉晋佚书的资料尤为珍贵。后世将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注》与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、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并称,说明了其史料及学术价值。注文不仅显示了刘孝标的学问淹博,体现汉代经注的严谨学风,不少地方也显示了他兼擅三教义理,识断精审,并非是只会广征博引的“书簏”。如《世说·文学篇》“康僧渊初过江”条注曰:“僧渊氏族,所出未详。疑是胡人。”与《高僧传》所记正符。又如同篇“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”条注曰:

僧肇注《维摩经》曰:“维摩诘者,秦言净名,盖法身之大士,见居此土,以弘道也。”波罗密,此言到彼岸也。《经》云:“到者有六焉:一曰檀,檀者,施也。二曰毗梨,毗梨者,持戒也。三曰羼提,羼提者,忍辱也。四曰尸罗,尸罗者,精进也。五曰禅,禅者,定也。六曰般若,般若者,智慧也。然则五者为舟,般若为导,导则俱绝有相之流,升无相之彼岸也。故曰波罗密也。”渊源(殷浩)未畅其致,少而疑其多,已而究其宗,多而患其少也。

殷浩本是玄学清谈名士,初读佛经,未入佛学之堂奥,自然觉得《心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文字繁多;随着他佛学造诣的日渐精深,对一些较深奥难懂的佛经也觉得文字简洁了。这正符合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。刘孝标早年为僧,精研过佛经,因此深明此中三昧。又如,同篇第59条:“殷中军被废,徙东阳,大读佛经,皆精解。唯至‘事数’处不解。”刘注曰:“事数:谓若五阴、十二入、四谛、十二因缘、五根、五九、七觉之声。”此处若非刘孝标的注解,一般读者不易理解“事数”的含义。刘注中类似这样解释典制名物、阐发三教义理的文字还有不少;至于他补充史料、考订史实的注文更是随处可见。正如陈垣先生所说:“孝标之注《世说》及撰《类苑》,均受其在云冈石窟寺时所译《杂宝藏经》之影响。印度人说经,喜引典故,南北朝人为文,亦喜引

典故。《杂宝藏经》载印度故事,《世说》及《类苑》载中国故事。当时谈佛教故事者,多取材于《杂宝藏经》;谈中国故事者,多取材于《世说新语注》及《类苑》,实一时风尚。”可见刘氏注文的详赡风格实受早年译经的影响。

除了《世说新语注》之外,《文选》卷五十五还载有刘孝标注陆机《演连珠五十首》。李善注引傅玄《叙连珠》曰:“所谓连珠者,兴于汉章之世,班固、贾逵、傅毅三子,受诏作之。其文体,辞丽而言约,不指说事情,必假喻以达其旨,而览者微悟,合于古诗讽兴之义,欲使历历如贯珠,易看而可悦,故谓之连珠。”是当时文人逞才使学的游戏之作,以辞藻艳丽、句式骈偶为主要特征,刘孝标的注文也沾染了这种华丽文风。皮锡瑞在《经学历史》中曾批评南朝文人的经注:“名言霏屑,骋挥麈之清谈,属词尚腴,侈雕虫之馀技。如皇侃之《论语义疏》,名物制度,略而弗讲,多以老庄之旨,发为骈俪之文。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。”^[3]虽是针对南朝经注而发,也切中刘氏注文之弊,即注文中多用骈文笔法,且多用语典。如《演连珠》之六:“臣闻灵辉朝睹,称物纳照,时风夕洒,程形赋音。是以至道之行,万类取足于世,大化既洽,百姓无匮于心。”刘注曰:“言至道均被,万物取而咸足,淳化普洽,百姓用而不匮。犹灵耀睹而品物纳光,清风流而百籁含响也。”就是典型的骈俪句式。但刘孝标也对文中的某些典制名物进行了训解,显示了他扎实深厚的考证功力。

永嘉之乱导致的长期分裂及南北对峙,阻隔了南朝与北朝的经济文化交流,造成了南北学风的差异,这种差异在晋室南迁之初就显示出来了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载支道林的名言:“北人看书,如显处视月;南人学问,如牖中窥日。”(余嘉锡案:此言北人博而不精,南人精而不博。)就透露了此中消息。其后,唐代官修的史书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等大致沿袭了上述说法。《北史·儒林传》:“南人约简,得其英华;北学深芜,穷其枝叶。”“南北所为章句,好尚互有不同。江左《周易》则王辅嗣,《尚书》则孔安国,《左传》则杜元凯,河洛《左传》则服子慎(虔),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则郑康成。《诗》则并主于毛公,《礼》则同遵于郑氏。”唐长孺先生认为,除了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经南北同遵毛、郑旧注外,南朝经学强调玄儒兼综,采用魏晋以来玄学化的新注为多,解经不拘家法,喜发新义,贵有心得独造;北朝学风则朴实保守,笃守汉儒的师传家法,以郑玄为宗,重视章句训诂,并杂以讖纬占候,不妄发新义,撰述较少。可概括为:“南学重义理,北学重名物训诂。”^[4]实为精辟之见。

当然,南北学风的差异又不是绝对的,即使在南北兵戈交争的对峙时期,学术思想上的交融吸

收也从未停止过,像刘孝标这样由北入南(或像王肃、王褒等由南入北)的学者因为先后濡染于两种学术氛围中,洞悉两种学风的优劣,因而在治学方法上能做到兼收并蓄,扬长弃短,其学术成就比那些拘守一隅的“陋士”要高出一筹。虽然刘孝标的著作大部分已佚,但从现存的《世说新语注》和《演连珠注》中,可以看出他兼综南北的治学风格,开创了隋唐南北学风融合的先河。

刘孝标自天监年间离开仕途后,就一直隐居在东阳(浙江金华),以著述讲学为业,“吴会人士多从其学”。梁普通二年(521)去世,享年六十,结束了他坎坷磨难的一生,门人私谥为“玄靖先生”。《梁书》本传未附其《自序》,在序中他将自己比作东汉的冯衍(字敬通),认为自己与冯衍的命运有三同四异:

敬通雄才冠世,志刚金石,余虽不及之,而节亮慷慨,此一同也。敬通值中兴明君,而终不试用;余逢命世英主,亦摈斥当年,此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,至于身操井臼,余有悍室,亦令家道轆轳,此三同也。敬通当更始之世,手握兵符,跃马食肉,余自少迄长,戚戚无欢,此一异也。敬通有一子仲文,官成名立,余祸同伯道,永无血胤,此二异也。敬通膂力方刚,老而益壮,余有犬马之疾,溘死无时,此三异也。敬通虽芝残蕙焚,终填沟壑,而为名贤所慕,其风流郁烈芬芳,久而弥盛,余声尘寂漠,世不吾知,魂魄一去,将同秋草,此四异也。

这篇自序有如史传的论赞,是刘孝标替自己坎坷磨难的一生所作的盖棺之论。因未能摆脱世俗的功利观念,他总结自己的一生不免悲愤交集,语调哀怨,自我贬抑过甚。自古雄才多磨难,刘孝标的一生是不幸的,但恰恰是磨难成就了他的学业,仅《世说新语注》一书,就在我国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使他的声名长留天地间,而他留下的《辩命论》和《广绝交论》两文,也足以让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他兼综南北的学术视野和治学方法,开启了隋唐时期南北学风融合的先河。同时,他命途多舛的一生也证明了“诗穷而后工”、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的人生哲理,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人生启迪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垣.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[C]//陈垣学术论文集(第一集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:445.(以下文中所引陈先生的文字,均出自该文)
- [2]此处关于刘孝标替《世说》作注的时间,参考了余嘉锡先生的考证。详见《世说新语笺疏》第23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。
- [3]皮锡瑞.经学历史第六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[4]唐长孺.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[M].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3:218.

责任编辑 陈冬梅